

中国能和平崛起吗？^{*}

巴里·布赞

内容提要 在过去的二百年里,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几经变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政策的变化,中国与国际社会发展出的密切关系超出以往任何时候。但是,在未来的三十年里,这一政策是否继续有效?本文认为,中国从现在开始需要考虑究竟要推动何种类型的国际社会以及地区与全球的平衡。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可能的,但并非坦途,这涉及到中国如何思考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以及如何处理与日本的麻烦关系。

关键词 和平崛起 国际社会 身份定位

一、引言

本文回顾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position),并且以

* 笔者在此对2008年12月16至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组织者和参会者表示感谢,这次研讨会在总体上启发作者写本文并为文中一些特别的观点提供思想源泉。笔者还对张永进、潘忠歧和CJIP约请的两位匿名评审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终稿前对本文提出有益评论。

《国际政治科学》2010/2(总第22期)第1—32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此为背景,评估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前景。笔者之所以坚持使用和平崛起这一说法,是因为相比近期在中国官方话语中取而代之的和平发展,用和平崛起表述这个议题更加准确^①。笔者认为,和平崛起意味着一个正在成长的大国在物质定位、身份(Status) 定位以及与国际体系其他大国的关系上均有能力获得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不会在其自身与邻国或其他主要大国之间引发严重敌对。和平崛起包含一个双向进程:崛起国使其自身适应国际社会规则与结构;与此同时,其他大国以适应新的权力与身份分布状况的方式调整这些规则和结构中的一部分。笔者不打算探究中国是否会崛起,尽管一些学者已经做了这方面的研究^②。相反,笔者把中国继续崛起作为前提,在当代国际社会范畴中探寻中国是否有可能和平崛起。

接下来一个章节回顾英国学派关于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文献,包括前欧洲时期、中国遭遇西方社会、20世纪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起起落落。第三个章节专门考察现状,特别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30年及其在和平崛起基础上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眼下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正处于比20世纪70年代末更大的转折点,而且过去30年来相当成功的一些政策在下一个30年中将不再有效,继续和平崛起将变得更加困难。第四个章节展望未来,关注中国面临的三个国际政治和战略挑战:与美国关系,与日本关系,以及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这三对关系在某些方面大相径庭,但在国际社会区域(东亚)层次和全球层次上,它们在一些重要方面相互关联。这三对关系加起来将对和平崛起前景产生重要影响。在笔者看来,这三对关系在均对中国构成挑战的同时,也为中国提供机遇。笔者认为,中国领导层需要抓住这些机遇,如果未能做到这一点,这些机遇将依然是问题,而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将变小。

笔者不是中国政治或中国外交政策的专家,也不懂中文。因此,笔者主要通过英国学派这一理论棱镜回顾中国的国际定位以及英国学派关于国际社会的主要观点;此外,还有一些按照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进行的分析,并且尝试把这

^① Bonnie S. Glaser and Evan S. Medeiros, "The Changing Ecology of Foreign Policy-Making in China: The Ascension and Demise of the Theory of Peaceful Ris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0, 2007, pp. 291-310.

^② Yue Jianjong, "Peaceful Rise of China: Myth or Realit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5, No. 4, 2008, pp. 439-456.

种分析与国际社会联系起来。所谓国际社会，意指接受国家间充分共有、能形成一种社会秩序的深层次游戏规则。赫德利·布尔将其称为无政府社会^①，国际社会最可见的形式体现在首要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上，它们能够进化，以构成国际关系游戏及游戏参与者^②，界定哪些行为合法、哪些不合法^③。这些基本制度——比如主权、不干涉、领土、民族主义、国际法、外交、大国管理以及族群平等——由那些支持深层次、可持续惯例的原则、规范和规则构成。它们与人们更为熟悉的次级制度(secondary institutions)(比如政权和政府间国际组织)区别明显，后者出现时间离现在更近，具有工具性，主要是由政府设计、对现代国际关系潜在社会结构的表述。首要制度构成国际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充满活力并且总在进化中，尽管这种进化通常缓慢并伴随大量惯性。关于首要制度的论战——例如殖民主义、奴隶制、主权、不干涉、和人权——其本身就是国际社会进化的驱动力之一。这类论战同样界定任何给定时期内国际社会的形态和优点(或弱点)。人们可以在全球层次和区域层次的国际社会中找到这些专门术语，这一特点在整个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比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自由主义(次级制度)及马克思主义(阶级冲突)，英国学派研究路径为理解国际关系有什么样的结构、这种结构如何运转提供了一种替代性描述。在笔者看来，相比任何其他替代性研究路径，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的关注为研究和平崛起提供了更开放、平衡且有细微差别的视角。在对权力分布保持敏感的同时，它能够避免那种伴随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宿命论性质和物质性冲突假定，能够使人们分析一些论述，比如哈利迪(Halliday)所说“任何国家或任何国际关系中都没有类似通往现代化的和平道路那样的事物”^④。通过考察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英国学派研究路径也能避免自由主义那种赋予次级制度和经济相互依赖太多重要性的乌托邦式倾向。国际社会的结构复杂、不均衡、充满争议并且总在进化中。这使得英国学派的

①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77)。

②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Law to Worl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61-270。

③ Ian Clark,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④ Fred Halliday,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xth Great Power*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9), p. 2。也可参见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观点没有“极”那样简单明确,但在涉及中国崛起这种深层次问题时,“极”这种显而易见的简约并不准确。社会结构这种视角更突出细微差别、植根于历史,有助于更加深入考察中国如何在全球和区域层次上与国际社会发生关联,更清晰考察这些不同层次关联之间如何相互联系。正如笔者将在下文中所展示的,现在英国学派也已经有一篇关于中国将在哪个层次建设国际社会的文献。

通过使用这些工具,笔者希望既能提供一种局外人关于和平崛起的视角,也能提供一种或许能与中国内部话语相联系的议题设定方式。对我们所有人而言,中国崛起这个话题太重要,以至于既不能用一种过于简洁的理论框架来理解,也不能遵循民族主义式的自我理解。和平崛起不能单靠中国来完成,而只能靠中国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协力创造必要条件。因此,本文从回顾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如何展开的历史开始颇为有益。

二、回顾过去

英国学派关于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文献涵盖4个时期:(1)西方的存在取得压倒性优势之前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社会;(2)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试图适应西方国际社会并在其中谋得一席之地;(3)革命时期,中国在很大程度上疏远了西方国际社会并与之对立;(4)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段时期,中国重返一个更加全球化但依然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这段时期涉及中国试图改革并做出内部调整,以及西方国际社会内部变化和全球化进程导致的国际社会进化。

就第一个时期而言,少有文献考察西方的存在取得压倒性优势之前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社会^①。就像大部分关于中国历史的西方国际关系文献那样,沃森(Watson)主要关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至公元前221年)。

^①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 85-93; Zhang Yongjin, “System, 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ichael Cox et al., eds., *Empires, Systems and States: Great Transforma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43-63; Shogo Suzuki, *Civilization and Empire: China and Japan’s Encounter with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34-55.

中国在这段时期是一个独立的国际体系，其无政府性较欧洲历史更为典型。沃森和张永进通过考察主权、外交、军事和国际法元素（礼仪）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社会机制。尽管沃森同样发现相对均势，许多国家更倾向于搭便车^①。学界较少关注历时更长的中华帝国时期。这段时期内，中国具有超级大国的单极地位，处于宗主国体系中心。不过，这段时期现在开始吸引更多学者关注。沃森主要考察帝国式中央集权，而较少考察国际社会。张永进视朝贡体系为中华帝国主导的东亚国际社会的关键制度，并且说明这个体系如何因西方国家进入东亚而被完全摧毁。铃木省吾（Shogo Suzuki）更详细地探究儒教秩序的社会性质，涉及关于“中央王国”的争论，以及这种儒教秩序最终为西方国家和崛起的日本摧毁^②。中国国内也有学者开始推动这种儒教秩序的一些原则，使其成为一种更具集体主义、更和谐的替代性选项，以代替与中国传统思想冲突的、大部分西方国际关系思想包含的个人主义^③。为填补这一历史时期的学术空白，学界应当做更多工作，既研究帝国时期，也研究春秋战国时期，以丰富关于比较国际社会的文献。但是，就本文写作目的而言，关键是与西方的遭遇摧毁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社会，而且要求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迥异的、外部强加的国际秩序做出让步。中国被动地从一个帝国向一个普通国家转变、从中心变成外围的一部分。

接下来回顾关注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中国“遭遇”西方国际社会具

①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 88.

② Shogo Suzuki, *Civilization and Empire*, pp. 34-55, 148-176.

③ Song Xinling, “Buil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0, No. 26, 2001, p. 70; Yan Xuetong, “The Rise of China in Chinese Ey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0, No. 26, 2001, pp. 37-38; Yan Xuetong, “Xun Zi’s Thought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2, No. 1, 2008, pp. 135-165; Zhao Tingyang, “Rethinking Empire from a Chinese Concept ‘All-Under-Heaven’ (Tian-xia)”, *Social Identities*, Vol. 12, No. 1, 2006, pp. 29-41; Li Mingjiang, “China Debates Soft Power”,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2, No. 2, 2008, p. 292. 也可参见 William A. Callahan, “Remembering the Future—Utopia, Empire, and Harmony in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0, No. 4, 2004, pp. 569-601 and William A. Callahan,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Post-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4, 2008, pp. 749-761.

体情况的文献。在中国人眼中,这段时期堪称“百年耻辱”^①。这段时期之始,中国不再有能力抵抗西方军事压力,同时内部不断分裂,沦为半殖民地,先是受到西方列强和沙俄压迫,接着受到日本(日本对现代化和西方国际社会的接受与适应比中国更快也更成功)压迫。至20世纪中叶,尽管仍陷入大规模内战,但中国已经以平等条件融入西方国际社会,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甚至获得正式的大国地位,尽管这种大国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更属于荣誉性质,而非真实能力的反映。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好比西方国家内部以非常野蛮行为进行的内战,削弱了“文明标准”,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②。这篇文献认为,从1911年(中华民国诞生)到1920年(加入国际联盟)、再到1943年(废除治外法权)的不同时期,中国或许已经令国际社会相信,它已经超越二等国家地位、完全融入国际社会。

对第二个时期进行研究的文献考察了中国向由西方设定的“文明标准”妥协的尝试,以及中国内部围绕是单靠努力重新获得大国地位、还是进行更深层次现代化改革来实现这一点产生的分歧^③。这些文献还考察了西方国家内部对“文明标准”的动摇不定和最终遗弃。江文汉(Gerritt W. Gong)对“文明标准”的重要研究认为^④,欧洲国际社会的扩张要求认同观念不断变化,从“基督教徒”到“欧洲文化”(19世纪对美洲定居国进行殖民化期间用来吸引美洲人和其他欧洲后裔^⑤),最终在19世纪末非西方国家开始符合融入国际社会的条件时^⑥演变成“文明标准”。这些变化反映出一种针对其他文化的文化傲慢(堪比伊斯兰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以及平等国家之间的互动的必要性,后者要

^① Gerrit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p. 136-163; Gerritt W. Gong, "China's Entry in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71-183; Zhang Yongjin, "China's Entry In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Beyond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1, 1991, pp. 3-16; Zhang Yongji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1949*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8); Shogo Suzuki, *Civilization and Empire*, esp. pp. 56-113.

^② David Armstrong, *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p. 158-169.

^③ Shogo Suzuki, *Civilization and Empire*.

^④ Gerrit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⑤ 同样可参见 Adam Watson, "New States in the Americas", in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27-141.

^⑥ Gerrit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 4-6.

求符合某种标准的有效政府,尤其是有能力满足法律上的互惠义务^①。19世纪内,国际社会自身也在不断进化,最为显著的是民族主义上升、市场成为新的制度,这些同样属于这类情况^②。

江文汉在论述“文明标准”时明确陈述了文明的冲突,以及这种标准如何制造压力,要求非西方国家服从西方价值观和惯例。西方价值观和惯例在文化上对非西方国家构成巨大挑战,许多非西方国家为争取融入国际社会,不得不违背自身文化传统。正如铃木省吾所说,西方国际社会有两面性,一面是其在西方成员内部体现更加有秩序、更平等的特点,另一面则是不平等且采用强迫手段对待外来者^③。这种两面性为国际法遗留下一个依然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一些人至今仍然认为国际法反映的是西方帝国主义价值观^④。江文汉解释说,正是欧洲人的需要(贸易、改变信仰、旅游)驱动“文明标准”发生功能性变化(保护在其他国家欧洲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进而要求当地人不能或不愿意提供的治外法权和不平等关系^⑤。非殖民化为作为一种国际社会机制的殖民主义^⑥和文明标准画上句号。随着民族自决权和主权平等成为几乎无条件的准则^⑦,西方帝国的相继解体并不真正质疑融入条件这一问题,这与较早期“遭遇”西方国际社会的国家已经做过的方式毫无相同之处。江文汉进行了一番有趣的考察,后来又有其他几位学者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当代西方国家那些出于关心生命、自由和财产的人权主张与“文明标准”相当类似,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文明标准”在当代的延续或重生^⑧。

第三个时期涵盖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这一时期看起来或许处于和

① Gerrit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 64-93.

② James Mayall,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③ Shogo Suzuki, "Japan's Socialization into Janus-Faced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1, No. 1, 2005, pp. 137-164; Shogo Suzuki, *Civilization and Empire*.

④ Gerrit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 7-21.

⑤ Ibid., pp. 24-53.

⑥ Edward Keene, *Beyond the Anarchical Society: Grotius, Colonialism and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Kalevi J. Holsti, *Taming the Sovereig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⑦ 同样可参见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 296.

⑧ Gerrit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 90-93.

平崛起的对立面。关于国际社会的文献中,这一时期相对受到忽略,或者至少被包含在其他课题(冷战、革命)下。共产党1949年在中国取得胜利后,中国放弃先前融入国际社会的政策,在冷战中站到西方的对立面。冷战本身可以理解为西方国家集团与共产主义集团之间关于未来国际社会形态的一场重大冲突。这段时期内,西方国际社会经历重大转型,通过非殖民化和反对纳粹主义让“文明标准”走到终点。共产党中国在把自己置于西方国际社会对立面的同时,它的外交工具(machinery)实际上也遭到取代,因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仍由遭到失败的台湾国民党政府占据,许多国家仍然只承认台北的政权。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由张永进进行,他详细描述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西方国际社会的对抗^①。他认为,1949年后,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有20年的时间疏远(而非孤立于)国际社会,其间,美国对中国实施遏制政策,中国反对西方主张,两者相互作用。但即便在这段时期,中国依然发展了广泛的对外政治和经济联系,为与西方国家恢复外交关系和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席位铺平道路。哈利迪注意到,中国起初在对外政策上主动跟随苏联,即便在与莫斯科决裂后,中国仍然对试图输出它的模式或建立一个亚洲第五国际不怎么感兴趣^②。中国对其他国家左派的影响更多出于观念和榜样的力量,而非培植盟友和支持者。即便如此,哈利迪和阿姆斯特朗^③均注意到,中国支持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而与苏联决裂后,这种支持更多体现为意识形态竞争。从1970年开始,中国拾起以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社会话语,减少使用先前那些激进年代以阶级为基础的话语。相应地,随着“四个现代化”政策的提出,中国放弃经济上的自我依赖。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文化大革命年代那种极端激进主义不但使中国元气大伤,而且把中国至于严重安全威胁下,在国内引发反作用力,后者有力推动了中国重新与国际社会接触^④。

这种反作用力为最后一个时期提供有力支撑。这一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末开始,直到现在,关键主题为“改革开放”,中国内部改革推

① Zhang Yongji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1949*.

② Fred Halliday, *Revolution and War Politics*, pp. 110-116.

③ David Armstrong, *Revolution and War Politics*, pp. 176-184.

④ *Ibid.*, pp. 182-184; Song Xinning, “Buil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 62; Yan Xuotong, “The Rise of China in Chinese Eyes”, p. 35.

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发生转型。“改革开放”迄今依然是支配中国政治的观念^①。实际上，中国放弃了许多对抗西方的革命性做法（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前10多年时间内）。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重新开始1949年以前在国内改革基础上通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但这种类比并不精确。在这个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时期，中国是从一个比1949年以前的时期更为强大的位置行动，因此，当今中国是内部改革推动对外政策变化，而非以前由外部压力推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道路也比非殖民化运动以前更加开放。中国和国际社会都在前进。中国视自身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并且由此得出，这需要在区域和全球层次上均保持对外关系稳定^②。朝着这个目标，毛泽东时期那种深切敌对西方统治现状的革命性崛起政策令人瞩目地迅速转变为邓小平时期在现状内和平崛起的政策。张永进看到，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稳步地使自身适应国际社会并与其融合，自1971年开始以外交学徒面貌视人，而非在国际组织中充当革命者，并且主要在经济上融入国际社会^③。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才把国内事务解决到足以允许它以一种非革命者的姿态在政治上参与国际社会^④。但中国一直在追寻一个不断变动的目标，而且，当诸如人权、“良政”等创造出的一套新的“文明标准”时，给中国相当成功地采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标准与机制平添压力，使中国再次面临遭到疏远的危险^⑤。正如中国第一次“遭遇”西方国际社会时，中国并不接受完全西化，而是试图寻找一种稳定且可行的现代化改革与“中国特色”的混合方式。

这种普遍认同的视角得到其他学者的支持。他们同样既看到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急转弯”，也看到中国适应国际社会

① Jeffrey W. Legro, “What China Will Want: The Future Relations of a Rising Power”, *Perspectives of Politics*, Vol. 5, No. 3, 2007, pp. 505-534.

② Zhang Yongjing,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1949*, pp. 102-25, 194-243.

③ Ibid. pp. 73-91.

④ Ibid. pp. 91-125.

⑤ Rosemary Foot, “Chinese Strategies in a US-hegemonic Global Order: Accommodating and Hedg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2, No. 1, 2006, pp. 77-94.

与国际社会自身进化之间不断延续的紧张^①。秦亚青认为,这种“急转弯”式的变化由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内部发展驱动,其间这个国家经历国家认同、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界定相当深刻的变化,所有这些共同改变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最核心的变化是把国家经济发展列为首要任务,因为这推动中国脱离早先对待国际社会的革命者态度,朝着一种更像现状国家的定位,体现为参与许多国际机制,接受大多数普遍流行、管理区域与全球经济政治秩序的规则与规范。把发展放在首位意味着中国需要转变它的安全利益,从支配先前几十年、强调斗争与零和冲突的“军事—政治—领土安全”,变为强调维持稳定、参与全球政治经济、更具合作性的“综合安全”。比森(Beeson)补充说,综合安全也包括一种经济增长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政权安全考虑之间的紧密关联^②。尽管秦亚青承认老式的“军事—政治—领土”安全问题——最重要的是台湾问题——有可能打乱过去 30 年的发展进程,但他认为,在其他方面,中国正变成一个主要的现状大国,不断接受国际社会,不仅重视国际社会的工具作用,也接受国际社会的观念。

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经历重大转型,中国国内变化为这种转型提供主要解释,这一点清楚且没有争议。这种转型在许多方面已经成功实现,这一点也比较清楚。在区域层面上,多数东南亚邻国普遍把中国视为“好公民”,此外,在经历一个比较犹豫的开始后,中国已经较好地融入围绕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地区政府间组织^③。中国与朝鲜和韩国保持良好关系,近期甚至与台湾的关系也在改善。尽管经济关系密切,但中国与日本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依然面临困难(下文将进一步分析),对东亚形势产生重要影响。中

^① Wu Xinbo, “China: Security Practice for a Modernizing and Ascending Power”,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Practice: Material and Ideational Influ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15-156; Rosemary Foot, “Chinese Power and the Idea of a Responsible State”, *The China Journal*, No. 45, 2001, pp. 1-19; Qin Yaqing, “Nation Identity, Strategic Culture and Security Interests: Three Hypothes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S Journal*, No. 2, 2003, <http://irchina.org/en/xueren/china/view.asp?id863> (2008 年 12 月 4 日访问); Qin Yaqing, “China’s Security Strategy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East Asia”, transcript of a talk and discussion for the 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 7 July 2004 <http://www.spf.org/e/report/040707.html> (2008 年 12 月 4 日访问)。

^② Mark Beeson, “Hegemonic Transition in East Asia?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Pow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 No. 1, 2009, pp. 95-112.

^③ Ibid. p. 104.

国与许多邻国共有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它们以相当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式观点看待主权与不干涉，把政权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渴望保持区别于他人的文化价值观，承诺通过贸易和投资共同发展。更为广泛的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东亚国家在区域层次上比全球层次更重视主权和不干涉，而且它们都受到儒家文化影响，更倾向于等级体系、搭便车，而非均势^①。所有这些均显示，一个独特的东亚区域性国际社会已经部分成形。

全球层次上的形势更加复杂。中国在寻求从经济上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最显著的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为联合国维和行动^②与核不扩散作出部分贡献，但从政治上说，它的定位一直相对边缘化。尽管拥有大国地位，但中国是世界主导国家中唯一在意识形态上没有承诺民主的国家，对西方支配的政治秩序许多方面感到不满。它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往往显得相当被动，主要关心保护自己的国内利益。它对人权、民主和干涉持防御姿态，到最近，它还在环境问题上采取守势。中国在政治上遭遇几次挫折，最明显的是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反应，以及西藏问题。此外，在一些具体的国际合作领域，如太空科学，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排斥。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也因许多反对霸权的言论充满荆棘^③。因此，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层次融入国际社会取得实质性进展，另一方面，这种进展并不如它在区域层次那么令人印象深刻。在全球层次上，中国并没有受到与东亚地区那样有任何相同的“好公民”看待，正因为如此，中国对它在“软实力”上的弱势感到忧虑^④。

^① John King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David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p. 57–85; David Kang, “Hierarchy, Balancing 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 2003–4, pp. 165–180; David Kang, “Why China’s Rise Will Be Peaceful: Hierarchy and Stability in the East Asian Regio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3, No. 3, 2005, pp. 551–554. For a critique, see Amitav Acharya, “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 2003–4, pp. 149–164.

^② Bates Gill and Chin-Hao Huang, “China’s Expanding Peacekeeping Role: Its Significance and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SIPRI Policy Brief*, 2009, <http://books.sipri.org/files/misc/SIPRIPB0902.pdf> (accessed 13 March 2009); Shogo Suzuki, “Chinese Soft Power, Insecurity Studies, Myopia and Fantas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0, No. 4, 2009, pp. 779–793.

^③ Wu Xinbo, “China”.

^④ Li Mingjiang, “China Debates Soft Power”.

即便如此,相比多数其他近现代崛起的大国,中国过去30年的崛起看起来是和平的。德国、日本和苏联的记录相当符合哈利迪和米尔斯海默关于和平崛起不可能的断言。所有这三个国家对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排位提出挑战,苏联,以及更带争议的德国,还就根本游戏规则对现状提出挑战^①。作为谋取全球超级大国地位努力的一部分,所有这三个国家把尽快壮大军事力量列为首要任务,然后侵略和占领它们的邻国。讽刺的是,就中国的和平崛起而言,最明显可以用来比较的国家是美国,尽管人们并不愿意过于深入讨论这一类比。同中国相似,处于崛起阶段的美国试图从经济上融入世界,同时继续远离高级政治和均势,偏好经济发展胜过寻求世界级军事力量。同中国相似,美国拒绝承担领导责任,直到一些全球性事件迫使它这样做。

综上所述,人们可以得出结论,过去30年内,中国在寻求和平崛起上做得相当不错。中国从继承自百年耻辱时期和毛泽东时期反西方革命主义的贫弱位置出发。在注定要失败的苏联工程失败之前30年,中国开始摆脱这种工程,而且在冷战结束前10多年实现国内政策从革命主义180度转弯。除了那些可能提及的明显批评,更多观点认为,中国领导人把一把差牌打得相当好。他们实现中国国内经济转型,国家财富和国力极大增加。与此同时,他们在最大程度上维持住国内稳定,没有在邻国或其他大国中引发真实且严重的安全忧虑。的确,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担忧中国崛起,但这些担忧并没有支配它们的对华政策,没有出现伴随其他大国崛起的军备竞赛或战争预期。换言之,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看起来已经摆脱那条最初看来注定重复德国、日本和苏联动荡式崛起的道路,开辟出一条与周边国际社会更加和谐的新道路。首先,苏联解体缓解了中国的安全困境,为中国在东亚和南亚活动提供便利。其次,中国过去30年的崛起恰逢世界经济一段相对稳定、开放和繁荣的时期(尽管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发生数次区域性经济危机),极大促进了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政策。

^① David Armstrong, *Revolution and War Politics*, pp. 112-157, 163-164.

三、当前形势

如今的问题是,当前形势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有能力沿着过去30年的路程继续,或者这些形势意味着不同的挑战,需要不同的应对政策?解答这个问题的第一项任务是评估如何才能最好地描述当前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秦亚青认为,中国正不断成为一个现状国家,不仅接受用来计算自身利益的游戏规则,而且在观念上接受游戏规则,因为它视这些为正确观念。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当然,这种看法看起来不仅在中国学者中,而且在一些美国学者中非常流行^①。由此看来,我们需要审视国际社会自身的条件,看看它自身正在经历的进化如何改变与中国一起进行的这场游戏。

就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而言,秦亚青提出三种情况:修正主义国家、脱离国家和现状国家^②。他还是采用温特用来区分社会凝聚方式的卓越解释:强迫(强迫行为一致)、计算(工具性自我利益)和信念(从观念上接受)^③。显然,中国不再脱离(不关心)国际社会,因此选项只剩下修正主义国家和现状国家。如果我们把修正主义进一步划分为革命主义、正统派主义和改革主义,还会得到一幅差别更加细微的景象^④。英国学派关于这种区别的文献明确指出,修正主义类别中有两个不同因素起作用:首先,一个国家是否满意他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或排名,其次,它是否接受或争夺组成国际社会的机制。那么,是什么使中国当前在全球国际社会中的位置看来可以使用这些标准?

一个现状大国对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或排名以及国际社会的机制感到满意,在观念层次上接受这些机制。笔者怀疑这一点是否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情

^① Pan Zhongqi, "China's Changing Image of and Engagement in World Order", in Sujian Guo and Jean-Marc F. Blanchard, eds., *Harmonious World and 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 (New York/Lexingt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pp. 39-63; Feng Huiyun, "Is China a Revisionist Power?"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2, No. 3, 2008, pp. 313-334;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p. 5-56.

^② Qin Yaqing, "Nation Identity, Strategic Culture and Security Interests"; Qin Yaqing, "China's Security Strategy".

^③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④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Hemel Hempstead: Wheatsheaf, 1991), pp. 237-246.

况。自中国开始崛起以来,它几乎被定义为不满并试图提高自己的地位或排位,使之符合自身财富和实力。中国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却不是八国集团成员。另一点明显的是,中国并不完全满意西方支配的国际社会的所有机制。对那些多元主义性质的共存机制——主权、不干涉、民族主义、领土、反对霸权或反对均势,外交、国际法,中国给予强力支持;对那些自由派政治社会连带主义观念——人权和民主,以及最近的环保主义,中国强烈反对。除反对单极和霸权主义外,尚不清楚中国在多极化大国管理这一观念上究竟持何立场。尽管渴望提高它的大国地位,但中国看起来并不打算声称会发挥领导作用,相反,中国总是谈论国际社会应在所有层次的大国之间更大程度实现民主化^①。中国对市场支持的性质也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坦率地说,一个共产党政府能如此在观念上支持市场吗?或者这种支持必然是必须的,而不是精心计算的?正如勒格罗所预见的,一场真正严重且持久的全球经济危机——如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危机这般——或许能使人看清中国对市场的承诺和“改革开放”到底是工具性还是观念性^②。

一个革命性修正主义国家在观念基础上反对国际社会的首要机制。它希望或者退出(秦亚青称之为“脱离”)或者成为新的先锋,挑战国际社会主要规范性内容,并且试图推翻现行地位秩序和国际社会的形式。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显然属于这一类别,但现在显然不是。

一个正统派修正主义国家总体上对国际社会机制性结构和观念性内容感到满意,但与现状国家不同,它对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感到不满。在某些方面,中国符合正统派修正主义国家的描述。国际地位显然是中国主要关切的对象之一,中国也的确接受的当前国际社会的许多机制。但这种描述也有问题,因为正如上文所述,中国依然挑战一些机制,或者对其态度含糊。

一个改革型修正主义国家出于计算和工具理性的混合考虑,接受国际社会一部分机制,但它反对并且希望改革其他机制,可能还希望改变它的地位。这听起来是对中国在当前国际社会中定位的最好描述。中国在观念基础上接受

^① Hu Jintao, “Build Towards a Harmonious World of Lasting Pea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speech to the High-level Plenary Meeting of the UN’s 60th Session, 15 September 2005, pp. 1-5, <http://www.fmprc.gov.cn/eng/wjdt/zyjh/t213091.htm> (2009年1月19日访问)。

^② Jeffrey W. Legro, “What China Will Want”, pp. 3, 5.

多元主义性质的共存机制,至少在工具性上接受市场,反对政治上更自由主义的机制,希望提高它的地位或排名。与它对民主的抗拒相一致,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或全球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让中国感到不适,一些没有处理好的问题(最明显的是西藏问题)让它不安,克拉克认为的国际社会规范内化的关键驱动力(民主、人权、环境)也令中国不适^①。

把中国视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改革型修正主义国家有助于研究哪些因素将影响中国未来30年和平崛起的前景,也有助于突出以下观点:多个重要因素暗示,中国现在看来面临另一个实质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正刻画中国参与西方支配的国际社会的特征,正在改变中国如果继续和平崛起将不得不参与的游戏。这个课题自身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笔者将只是简单提出四个主要因素。即便仅仅是这四个因素,也暗示国际社会内在的自然进化将在未来几十年得到大力推进。国际社会进化越快,要把一个国家定位为现状国家或上文提到的各种修正主义国家就越困难。上文所述分类需要一个在全球范围内适度稳定(例如,进化缓慢)且相当意见一致的国际社会,如果这些条件不成立,人们不得不考虑各种各样的国际社会。

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因素是中国自身以及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中国的崛起已经足以成功改变它的定位。中国曾经是一个贫穷、落后的经济体、一个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属国,如今,中国经常谈论它自己的权利,因为它已经是世界经济的引擎之一,还是一个或许很快能取得超级大国地位的大国。中国已经重新获得它在19世纪失去的一些力量和地位,其他国家如今正把它当做系统大国之一对待。中国可以不再装作是一个边缘化大国,或者在世界政治上扮演学徒角色。如今,中国的行为将得到越来越多关注,既有正面,也有负面,仅仅因为这些行为是一个大国的行为,会产生超越中国边境的相当大影响。正如“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句话所说,国际社会的历史并不缺乏那些大国未能担负起它们的责任而导致消极后果的故事,最明显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单是正在崛起的大国这一事实就会改变中国的定位,招来要求它发挥更多

^① Ian Clark,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and Worl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领导作用的压力^①。鉴于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宣称它要发挥领导作用，这种外界对中国认知的改变自身就意味着中国未来 30 年不可能像过去 30 年那样。

第二个因素是自 2008 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这场危机由金融业过度扩张导致泡沫破裂以及相应信贷枯竭引发，将几乎肯定对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造成重大且持久影响。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将不再有能力维持任何过去水平的从中国进口。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持有者，如果美国决定采用通货膨胀方式（例如“数量宽松”）化解美国政府在债券市场堆积起来的庞大债务，那将推倒保持中美关系稳定的支柱之一。如果中国要维持它认为对于维持社会政治稳定来说十分必要的经济增长水平，它将不得不寻找一条迅速且可持续的扩大国内市场的道路。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促进中国改革开放、相对良好的经济环境显然已经结束，使中国对外开放受益的意识形态框架“华盛顿共识”也已走到尽头。眼下远不清楚当前这场危机将持续多久，也远不知道重建后的世界经济将会是什么样子。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将不得不适应这种重建，而且中国如何适应可能受到以下事实影响：中国的主要政治盟友在重建世界经济上经济利益较少，而它的主要经济伙伴，特别是美国和日本——如果它们还算不上政治上的敌人——仍然远不是中国的朋友。正如勒格罗（Legro）所指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持迄今由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②。

第三个因素是愈演愈烈的地球环境危机。这场危机暴发于 21 世纪，恰逢人类人口增长高峰。环境变化是国际关系中一种未知因素。它可能迅速且深刻改变游戏性质，但很难精确预测这种变化何时发生、怎样发生。环境危机将更具持久性，可能轻易起到比经济危机迄今更大的转型作用。气候变化、污染、海平面升高、海洋难以继续为人类提供食物，都会在全球层次和区域层次上对人类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中国自身已经面临环境问题（例如污染、水资源匮乏、洪水、疫病），也躲不开全球性环境问题。如果环境变化迅速且猛烈发生

^① Bates Gill and Michael Schiffer, “A Rising China’s Rising Responsibilities”, Working Paper, The Stanley Foundation, 2008, p. 19, <http://www.stanleyfoundation.org/articles.cfm?ID=531> (2009 年 8 月 6 日访问)。

^② Jeffrey W. Legro, “What China Will Want”。

(例如,海平面上升数米,以及/或者温室效应失控)就不难想象国际社会游戏规则将发生怎样的转型。洞悉这种转型的方向则更加困难,可能朝向更高水平的国际合作、甚至全球治理,寻求环境稳定,也可能朝向更高水平的冲突。关键是,不论朝哪个方向转型,中国和平崛起的环境也将转型。

第四个因素是美国在国际社会领导地位的危机。这场危机引发一个疑问:国际社会是否会走向一个领导地位弱势或分裂的时期?这场危机源自布什政府时期美国领导地位合法性的降低,而非源自美国物质力量的任何下降。这为正在崛起的大国提供一个关于国际社会中合法性对大国地位重要性的教训:物质能力仅仅是大国地位的一个方面。这场危机的性质现阶段还不是非常清楚。它可能是奥巴马政府充分有能力重新恢复美国领导地位合法性,也可能是布什政府已经如此严重损害了“自由事业”的信誉度,在政治和经济上如此严重削弱了美国,以至于无论奥巴马做得多好,美国已经不再可能领导全球。奥巴马继承了一个如此虚弱和受损的位置,以至于难以看到重建单极秩序的任何可能,因此,国际社会领导力出现一定程度的去中心化看来不可避免^①。眼下尚不清楚中国将做出何种反应。中国看起来不渴望宣布自己会担负领导责任,而且它缺乏软实力^②,即便它想这么做,也缺乏足够的全球合法性。但中国同样看起来对美国领导地位的危机有着矛盾心理。一方面,中国话语中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强调国际社会需要更加多极化,暗示中国会为一个变弱的美国感到欣喜;另一方面,中国强调国际稳定是中国继续发展的关键要求,暗示中国会愿意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至少暂时维持,使其成为中国国内发展的一个支柱。当美国和世界经济都处于强势时,这对矛盾容易维持平衡,但当美国和世界经济都走软时,这对矛盾就更加难以调和。不管中国是否愿意,也不管它是否需要为将来定位做出决定,中国或许会都得发挥更加明确的领导作用。

这四个因素,无论单个还是在一起,都显示中国和平崛起的未来30年与过去30年由有任何相似性的前景相当小。中国承诺加入的国际秩序特别是经济秩序正处于麻烦中,并且无法向以前那样继续维持。中国的崛起在某些方面是

^① Barry Buzan, “A Leader Without Followers?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Politics after Bush”,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5, No. 5, 2008, pp. 554-570.

^② Li Mingjiang, “China Debates Soft Power”.

这个麻烦的一部分,尽管中国崛起只是主要加快曝光全球资本主义在环境和金融局限方面的内在结构局限。在某些方面与日本类似,中国扮演配角,最明显的是通过支持美国国债换取贸易便利。中国已经把自身内部改革发展、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与全球经济的规则和结构联系起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下国内也出现一个显著趋势,即中国对自身发展采取一种相当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对外界而言,最能象征这种与文化相关联的视角或许是人们经常听到的“中国特色”,这个短语暗示一种封闭型的民族例外论。与美国自由主义那种普世主义性的自满心理不同,“中国特色”指向一种文化上独特的处事方式,这些事情并不必然与中国文化之外的事物有联系。这种封闭型视角还具体体现为这类主张,即中国只要发展好自己、和平崛起,就是对世界秩序做出主要贡献^①。

这些主张,连同那些不希望被视为美国挑战者的口气较轻的观点^②,均用来为中国低调应对大国管理责任提供借口。实际上,中国一直说,它自身的发展问题已经足够大,牵制了它全部的管理能力,而正因为中国人口非常多,成功管理它自身的发展将能使全人类受益。从这个视角看,这些肯定是构成真相的重要元素,从外界对下列事实积极的反应就可以看出:中国使数以亿计人摆脱贫困,中国廉价出口产品对西方国家通货膨胀的良好抑制效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之一。但这些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并不怎么良好的一面反映于以下这些观点:中国的发展加剧全球变暖、导致资源更加稀缺,抬高商品价格,支持第三世界依靠镇压的政权,以牺牲人权为代价,创造一个非民主的大国,可能变得民族主义和令人不快。中国内部有种趋势:自我感觉良好,脑中浮现几许“中央王国”的回忆,尽管这一次并不怎么拒绝外国观念。讽刺的是,随着培育这种自我感觉,中国使自己变得像美国,后者也是以自以为是的观点出名,即美国必须为世界做好事,因为美国是好的,代表人类的未来。然而,即使如此自我审视,美国至少还能利用一种普世主义性质自由派意识形态,后者可能在原则上适用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没有这种软实力(远低于美国)或普世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如果中国也想让这种感觉良好的自我审视为外国接

^① Yan Xuetong, “The Rise of China in Chinese Eyes”, p. 38; Hu Jintao, “Build Towards a Harmonious World of Lasting Pea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p. 4.

^② Yan Xuetong, “The Rise of China in Chinese Eyes”, pp. 36-37; Zhu Wenli,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from A Chinese Angl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0, No. 26, 2001, pp. 45-54.

受,可以说对自身的定位比美国偏得多。正如近期美国在布什政府统治下的经验说明,如果大国的自我感觉与国际体系其他行为体对它的看法大相径庭,大国会失去很多。

四、展望未来

如果“基本照旧”不会成为中国继续和平崛起进程行得通的路径这一论断得到认可,那么中国对外政策正面临怎样的挑战和机遇?上文提到的经济与环境问题开启了宽泛且含有许多不确定性的议程,笔者在此不作深入论述。以下将集中探讨引言部分提到的中国面临的三大关键性国际政治与战略挑战,即中国与美国关系、与日本关系以及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一) 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一个我们熟悉且不断发展的课题,但其基本特征一直没有发生太大改变。主要有三大因素决定双方关系产生紧张:首先,中国依赖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提供中国发展需要的(外部环境)稳定;其次,中国希望避免重蹈其他非民主大国崛起的覆辙、卷入与美国的冲突;再者,中国憎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反对美国霸权和单极权力结构。中国继续崛起可能产生危险的结果——中国逐渐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越来越反对美国的领导地位,中国不断变强的实力和修正主义令美国越发感受到威胁。中国继续崛起也可能产生良好的结果——中国更加融入国际社会,成为一个更加负责任的现状国家,并且不被美国视为威胁。到底哪一种会变成现实,部分取决于中国国内政策的转变:市场经济的运转可能促使中国政治变得更多元、甚至民主——一些人对此充满希冀,另一些人则忧心忡忡;或者,快速发展的压力和全球经济衰退令中国进入一段极端民族主义的时期——这大概会令几乎所有人恐惧。中美关系未来前景也取决于美国国内发展、美国将中国建构为伙伴还是挑战者。这两种因素相互作用,但并不完全相互依赖。

问题部分在于,在两国政策思维中颇具影响力的现实主义者们认为,中国崛起将不可避免地至少导致对立和紧张,最坏甚至导致类似德国、日本与苏联

崛起时发生的严重对抗^①。正如美国政策话语以及持续不断的关于“中国威胁论”的文献^②所指出,美国的确有一群相当强势的人为了恢复美国外交政策目标自冷战结束以来愈发难以察觉的明确性,支持将中国的形象塑造为“同类竞争者”。如果这些人的声音最终赢得全美国赞同,中国的和平崛起将变得困难。因此,中国亟需一方面尽力使这些人满意,另一方面需要全力支持那些主张通过把中国带入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加强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院外游说集团。即便“中国威胁论”最后还是成为所有美国人的共识,中国仍需不遗余力地以和平方式实现崛起。如果这些现实主义者观点正确,而且美国必然因中国的崛起感到威胁——因为无论这种崛起是否采取和平方式,都注定会质疑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领导地位,那么至少中国还有相当好的机会使世界其他主要大国不会因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感到威胁。那些国家如今多对美国霸权表示反对,主张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加多极的世界秩序,它们或许非常欢迎中国的崛起,但中国需要付出比安抚这些“远亲”更大的努力来让自己的“近邻”安心。

如果中国展现相当善意、不对邻国使用武力,而且完全按照全球经济秩序规范行事,欧洲便不会太在意中国的崛起,也不会为此感到威胁。俄罗斯的情

^① Yan Xuetong,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Power Statu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No. 1, 2006, p. 7.

^② Richard Betts, “Wealth, Power and Instability”, *East Asia and the US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1993, pp. 34-77; Aaron L. F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1993, pp. 5-33; Paul Dibb, “Towards a New Balance of Power in Asia”, *Adelphi* 295 (London: IISS, 1995); Denny Roy, “Hegemon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p. 149-168; Denny Roy, “Rising China and U. S. Interests: Inevitable vs. Contingent Hazards”, *Orbis*, Vol. 47, No. 1, 2003, pp. 125-137;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Munro “China I: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1997, pp. 18-32; 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1999, pp. 81-118; Robert Ross,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3, 2006, pp. 355-395; Adam Ward, “China and America: Trouble Ahead?”, *Survival*, Vol. 45, No. 3, 2003, pp. 35-56; Peter Hays Gries, “China Eyes the Hegemon”, *Orbis*, Vol. 49, No. 3, 2005, pp. 401-412; Thomas J. 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the Challenge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2001, pp. 5-40; Thomas J. Christensen,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 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2006, pp. 81-126.

况更复杂一些 因为它是中国的邻国 ,一直担心中国觊觎俄罗斯远东人烟稀少的土地。不过 这两个国家发展了一种非常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① ,经济互补性多且有益 在互不干涉及政权安全上有共同利益。俄罗斯或许非常希望继续与中国结盟应对美国。印度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它不得不继续在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争取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以及渴望在国际地位上不被中国压倒之间求得平衡。除非中国变得令人厌恶和恐惧 ,印度将很可能努力继续现在的做法 ,让美国和中国相互制衡 ,把制衡中国的主要经济和政治成本转嫁给美国^②。更有可能的是 ,中国最近的邻国之一日本或许也不会对中国崛起感到威胁 ,虽然这种情况或许最为复杂(下文将进一步讨论)。鉴于中国的崛起无法避免对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构成威胁 ,如果不能消除美国这种威胁感 ,对中国而言 ,最好的情况就是必须确保只有美国会反对中国 ,而非整个西方世界或其他大国。如果只有美国反对中国的崛起 ,世界回到两极高度对抗的冷战时代的可能性便会大大减小。一种受到约束的和平崛起或许仍然可能实现。

中美关系在两个层次上运转: 一个为区域层次(东亚)——美国在这一区域以干涉性力量的形式存在 ,二是全球层次 ,这一层次关注整体权力结构和机制。这两个层次彼此联系 ,这种联系凸现一个关于中国为稳定外部环境对美国形成的依赖是何性质的重要且难解的疑问: 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是否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 ,通过提供公共物品、控制区域特别是东北亚区域的冲突和对立 ,发挥巩固区域秩序的主要作用^③? 还是像另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 ,美国在东亚的

^① Peter Ferdinand, "Sunset, Sunrise: China and Russia Construct a New Relationship",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3, No. 5, 2007, pp. 841-867; Thomas Wilkins, "Russo-Chines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 New Form of Security Cooperation?",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29, No. 2, 2008, p. 358.

^② Barry Buz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Cambridge: Polity, 2004), pp. 107-131; Simon Bromley, *American Power and the Prospects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2008), p. 151; David Scott, "Sino-Indian Security Predicament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sian Security*, Vol. 4, No. 3, 2008, pp. 244-270.

^③ Michael Mastanduno, "Incomplete Hegemony: The United States and Security Order in Asia",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Order: 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41-170; 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2004, pp. 64-99; Evelyn Goh, "Hierarchy and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st Asian Security Ord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8, No. 3, 2008, pp. 353-377.

存在加剧分化并打破原本能够自我稳定的东亚秩序^①?抑或是事实并不怎么取决于上述任何一种解读,而是更多取决于由中国与美国的具体行为^②?如果美国在东亚的存在确为区域稳定做出贡献,那么美国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在这一区域层次上建构一种遏制来限制中国崛起。只要美国没有实施撤出东亚、以观后效的实验,我们就极难得知上述哪一种解读最接近事实真相。但这个疑问明确强调,在东亚,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筹码非常大,也再次指出中日关系在中国崛起总体蓝图中的重要性。

无论美国在东亚的存在究竟是巩固或削弱区域秩序,和平崛起的逻辑要求中国与邻国发展良好关系。正如前文所指出,中国已经成功地与东盟、与韩国和朝鲜维持良好关系,现阶段已开始与台湾发展良好关系。几乎所有撰文讨论东亚区域的学者都同意,台湾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潜在危机爆发点。台湾与大陆双方任何不小心的行动可能导致区域秩序乃至全球秩序崩溃。中国绝对必须尽全力把台湾问题纳入和平崛起的政策,避免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中国以武力完成统一会导致中国区域和全球层次上政治定位、甚至可能是经济定位的巨大损失,得不偿失。如果台湾问题经由武力解决,和平崛起的政策即宣告终结。

(二) 中日关系

从中国和平崛起以及国际高级政治的总体视角看,中日关系或许是世界上最重要 的双边关系。但中日双方均未注意到这一点。中日关系研究者普遍认

^① Muthiah Alagappa, “Preface”, and “Managing Asian Security: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and Evolutionary Change”,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Order*, pp. ix-xv, 571-606; David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David Kang, “Hierarchy, Balancing and Empirical Puzzles”; David Kang, “Why China’s Rise Will Be Peaceful”; Mark Beeson, “American Hegemony and Regionalism: The Rise of East Asia and the end of the Asia Pacific”, *Geopolitics*, Vol. 11, No. 4, 2006, pp. 541-560.

^② Amitav Acharya, “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为，中日关系处于低谷并有继续恶化的趋势，两国应在不同方面对此负责^①。虽然中日经济关系愈发紧密，但两国政治关系薄弱而不恰当，在更深层次上，两国社会之间的关系仍然受到历史问题的不良影响，正在不断恶化。双方政治领导人并没有采取多少措施应对这一问题，有时甚至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两国民众之间的隔阂与敌意不断加深，使得两国关系面临即将陷入螺旋式下降的危险，即任何一方的回应都可能招致报复，令分歧深化、扩大、更难以解决。允许这种形势继续存在，对两国都是消极的，更由于日本是美国在东亚战略定位的关键因素，上述形势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影响更是极其消极。

两个主要大国的双边关系受历史问题困扰，注定给和平崛起和国际社会的发展带来疑问。以中国和日本的情况为例，即便是中国最强硬的现实主义学者也明白，当前形势会产生不利的战略后果：中日关系糟糕等于送给美国一件巨大的礼物，华盛顿那些“中国威胁论”鼓吹者们正为此欢欣雀跃。日本感到受中国威胁，不仅为近期日美同盟关系加强提供支持理由，也巩固了美国在东北亚军事和政治定位的合法性。美国因而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赌金持有者（ring holder），而且从现实主义视角看，美国认为中日关系改善于己无益。与日本关系糟糕，明显同中国在区域内和平崛起的可能性相矛盾，也令人们对于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所有言辞产生怀疑。如果中国不能与周边大国友好相处，将削弱中国号召建立和谐、多极国际体系的基础。对那些认为中国必须最

^① Rex Li, “Partners or Rivals? Chinese Perceptions of Japan’s Security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2, No. 4, 1999, pp. 1-25; Reinhard Drifte, “US Impact on Japan-China Security Relations”, *Security Dialogue*, Vol. 31, No. 4, 2000, pp. 449-462; Gilbert Rozman, “China’s Changing Images of Japan 1989-2001: the Struggle to Balance Partnership and Rival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Vol. 2, No. 1, 2002, pp. 95-129; Michael Yahuda, “The Limits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unpublished m/s, 2002, p. 13; James Reilly, “China’s History Activists and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History in the Making”, *Asian Survey*, Vol. 44, No. 2, 2004, pp. 276-294; Peter Hays Gries, “China’s ‘New Thinking’ on Japan”, *China Quarterly*, No. 184, 2005, pp. 831-850; Denny Roy, “The Sources and Limits of Sino-Japanese Tensions”, *Survival*, Vol. 47, No. 2, 2005, pp. 191-214; Tamamoto Masaru, “How Japan Imagines China and Sees Itself”,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22, No. 4, 2005, pp. 55-62; June Teufel Dreyer, “Sino-Japanese Rivalr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Nations”, *Asian Survey*, Vol. 46, No. 4, 2006, pp. 538-557; Foot Rosemary, “Chinese Strategies in a US-hegemonic Global Order”; Mike M. Mochizuki, “Japan’s Shifting Strategy Toward the Rise of China”,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3/4, 2007, pp. 739-776; He Yanan “Ripe for Cooperation or Rivalry? Commerce, Realpolitik, and War Memory in Contemporary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sian Security*, Vol. 4, No. 2, 2008, pp. 162-197.

终与美国对抗的中国强硬派现实主义者来说,与日本关系糟糕无异于一场战略灾难。树立一个与远方对手阵营相同的近敌,不仅同中国自身在对美关系中的长期定位矛盾,也为美国插足中国所处区域提供充分优势。

中日之间在国家与经济发展关系上的分歧大概比中美、日美之间小,但中日两国忽视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妨碍它们发挥更多合作优势。如果中国主动改善与日本关系,就可能开始削弱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并在长远上削弱美国的全球地位。由于这种转变将主要在社会—政治认同领域实现,美国将难以实施制衡。以往事实显示,美国可以轻易促使日本产生“中国威胁”印象;如果中国能够改变自身认同构建方式,淡化而非强化中日从19世纪90年代到1945年间的历史冲突,美国想故技重施就会变得更加困难。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建立在社会关系(即日本和欧洲联盟这两大力量总体上接受美国领导地位)和自身物质能力两个方面,因此,日本能发挥区域性乃至全球性中枢作用^①。

从战略上说,全球地位与区域大国这两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非常重要^②。置身区域纠纷之外是通往超级大国地位的最容易途径。美国和英国均采用这一战略成功崛起。如果因地理位置限制不能隔岸观火(如德国和中国),通往超级大国地位的另一条途径则是取得所处区域主导权,这可以通过征服来实现(日本、德国和苏联试图这么做),也可以通过达成有共识、用国际机制协调大国行为的区域秩序来实现。征服所处区域今天既不流行也不合法,而且现代历史证明,这种方式注定“短命”。像美国和欧盟那样建立有共识的区域秩序更多在于维持当代大国政治,即少使用军事胁迫、多展示组建和维持联盟的能力、创立和管理政权和政府间组织,以及更深入创建(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社会。在没有世界性大战或世界大战威胁的今天,其他国家认可和接受美国和欧盟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合法性,已成为超级大国地位的判断标准。

区域霸权未能赢得共识而产生的问题可见于印度,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印度没有被当成一个大国来对待。俄罗斯即便使用武力也要不顾一切地控制其所处区域,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控制,俄罗斯将难以维系它摇摇欲坠的大国地

^① Barry Buz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pp. 134-140.

^②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位。在关于中国未来是否会获得大国乃至超级大国地位的所有辩论中,有一种批评观点就认为,中国是否有能力在与其所处区域建立某种形式有共识的关系。实现这一点能为中国提供获取超级大国地位的平台。由于陷入与日本的均势,印度及东南亚多半会把中国的势力范围限制在亚洲。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日关系在区域和全球层面上对中国如此重要。中日关系几乎可以视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定性问题。然而,当前事实显示,中国任由中日关系不断恶化,反而加强美国在东亚的地位,损害中国在本区域和平崛起的前景,放弃它在国际社会中的责任,并且削弱自身谋取全球大国地位的竞争力。如果中国严肃对待和平崛起,那么无论从战略逻辑还是国际社会的逻辑看,放任与日关系继续糟糕下去将是一个大错误。

(三) 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这一疑问不针对中国与任何一个特定国家的关系,而是针对中国与全球以及区域国际社会整体社会结构的关系。疑问的提出源于关于中国是不是现状国家的讨论,笔者认为,这可以更准确地表述为中国是不是改革型修正主义国家。思考这一疑问会发现一个问题,即中国政府没有清楚且完整地告诉中国民众和世界其他国家:它希望看到并愿意加入什么样的国际社会。时殷弘认为,“中国没有清晰且一以贯之的长期基本国家目标、外交哲学以及长期或长久的大战略”,这是“现今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最大的认知和政策难题”^①。尽管中国已经明确开始谈论它偏好的国际社会形态,但时殷弘的批评依旧掷地有声,如铃木省吾所说,现在远不清楚中国如何把对外政策不同因素组成连贯体系或反应某种政治愿景^②。

另一个问题是,尚不清楚中国在全球层面如何认识国际社会。不知道这一点,我们便难以得知中国如何在这场博弈中权衡自己的定位。虽然有过分简单化的风险,但就全球层面的国际社会存在两种一般性解读:

(1) 第一种观点或许可以称为全球化观点,认为国际社会已经相当均匀、

^① Shi Yihong, “The Rising China: Essential Disposition, Secular Grand Strategy, and Current Prime Problems”, 2001, <http://www.spfusa.org/Program/av2001/feb1202.pdf> (2008年10月31日访问)。

^② Shogo Suzuki, “Chinese Soft Power”。

即便程度不深地在全球层面形成。这种观点假定,与区域层面相比,全球性国际社会将变得更强,作为全球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例如资本主义)运转的结果,国际社会将日益同质化。这种观点认为,自由主义西方霸权将取得胜利,或是一些非西方因素与西方框架组合,形成某种妥协。

(2) 第二种观点或许可以称为后殖民主义观点,认为国际社会是一种不公平的中心—边缘结构,西方仍然扮演拥有特权但面临部分竞争的霸权角色,而非西方区域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西方的权力和价值观。这种观点假定,随着非西方国家崛起、西方主导国家相对衰落,国际社会将在全球层面弱化。反霸权主义会将加剧这种弱化,同时相对强化区域性国际社会,因为非西方文化试图重新强化其自身价值观并抵御(至少部分抵御)那些来自核心西方国家的渗透。

上述两种观点强调国际社会的区域层面与全球层面如何相互关联的重要区别。这些观点要求中国在处理区域层面和全球层面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时较现在更为审慎。中国是想寻求一种主要为全球化的战略,以改革全球层面的国际社会、使其更适应中国国内安排吗?还是想通过在东亚建立更强有力且更符合中国国内价值观的区域性国际社会,使自己孤立于后殖民主义时期全球层次的国际社会?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和它的许多邻国享有大量共同价值观,这已经为在东亚创立独特的区域性国际社会奠定基础。中国对外政策话语中有一些元素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即全球化观点,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那些强调需要稳定的话语,以及一些几乎采用自由主义视角看待转型国际关系的断言,例如“相互依赖使和平崛起成为可能并消除崛起大国面临的大部分安全困境。从诸如“和谐世界”、“和谐共存”以及“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①、做负责任大国等部分中国外交语言看,中国好像采用全球化观点;其他元素则倾向于后殖民主义观点,其中最明显的是强调反对霸权主义、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不干涉、维护政权安全以及保护中国文化和“中国特色”^②。然而,这两种对国际社会的理解在政治层面上区别相当大。由于对区域层面和国际层面之间的关系理解

^① Hu Jintao, “Build Towards a Harmonious World of Lasting Pea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② Zhu Wenli,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p. 47-49; Hu Jintao, “Build Towards a Harmonious World of Lasting Pea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Li Mingjiang, “China Debates Soft Power”, p. 302.

存在差异，很难说这两种观点如何能够同时存在。它们均为“实然”和“应然”提供了不同的见解。

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等领导人的演说中有可能推断中国理想的国际社会的基本轮廓^①。这一愿景几乎完全着力于全球层面，也与乔舒亚·库珀·拉莫提出的“北京共识”极为类似^②。中国强调一个和谐、和平、以相互发展为关键的世界，强调老式权力政治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崛起不应被视为一种威胁，从这些方面说，这一愿景反映国际社会的全球化观点。但这一愿景同时是多元主义的，可以追溯至经典的、极简主义的、国家中心的国际社会视角。后者非常强调应严格解读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强调文化与文明、社会体制与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支持维系这些特殊性的要求^③。游走在在全球化视角与国家中心视角之间，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多边主义，支持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尽管反对霸权主义，但在大国是否应当在多极化体系中发挥特许管理作用这一问题上，中国似乎一直保持沉默。和谐世界的构想表明中国试图概括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就此而言，中国开始接受亚当·沃森“体系理由(raison de systeme)”的观点，相信自己值得为体系有效运转而付出^④。但即便如此，这种世界观内部的张力仍未获得放松，在打消“中国威胁论”在外界引发的不安时，也滋长这种不安。中国仍需寻找一种方式，以向世界其他国家表达它对自身和对自身在国际社会定位的看法。和谐世界只是一个开始，但并不足以帮助中国继续和平崛起。

按照英国学派的理解，这一愿景代表一种新颖、或许独一无二的模式。其多元主义的一面几乎就是经典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强调文化与政治体制不同的国家和族群共存的逻辑，坚决主张主权平等、互不干涉，以保护文化和政治多样性。如今显然还没有要求文化或政治融合的呼声，不过，要求多样性的主张却罕见地与拒绝视国际体系为古典权力政治、充满冲突的观点结合在一起。与

① Hu Jintao, “Build Towards a Harmonious World of Lasting Pea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②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p. 74. “北京共识”这一说法并非中国人创造，也不属于中国外交话语。正如铃木省吾在《中国软实力》一书第787至788页所说，中国人还没有对其自身发展进程形成明确且充分的认识，更不用说有能力把这种认识以“北京共识”这种方式打包向外推销。

③ 也可见 Zhu Wenli,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p. 47–49.

④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 14.

此相伴的是一种相当自由主义、以市场为基础的观点,主张经济领域相互发展与相互依赖。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眼中,这种民族主义政治和自由主义经济的结合并不可取(因为它未能从文化与政治融合的积极视角使自由主义议程的经济层面与政治层面相结合),或者说不可能实现(因为全球市场运转的力量实在太强大,致使全球市场与巨大文化、政治差异难以共存,两者必有一方为另一方让路)。中国很容易从这种结合上看到政治吸引力。这种结合可以使中国继续保持非西化与非民主,同时允许它在全球市场和相互依赖的大背景下和平崛起。但这种结合是否稳定?这种看来自相矛盾的“体系理由”观点又是否能其他国家相信或接受呢?

这种中国观点中的内在矛盾迎合了那些持现实主义立场的外国人,他们害怕,一个崛起的中国一旦拥有足够能力,就会在区域和全球层面奉行无情的权力政治;这种恐惧在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同样有相当大影响力。换言之,对持现实主义观点的“局外人”来说,中国的愿景很容易读懂:中国只希望通过利用并参与全球经济增加自身实力和财富,但不会为社会和政治融合付出成本。在自由主义学者看来,只有社会和政治融合(自由民主和平)才能使全球市场的相互依赖在政治和领域获得接受。一个正在崛起的非民主大国因而对国际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而中国崛起又恰恰依赖这种稳定。由于国际体系在文化和政治上沿着自由民主路线变得更加同质化,国际体系正变得越来越和平。因此,如何在保持政治和文化多样性的同时整合经济,这一点在最好的情况下很难实现,在最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甚至像是骗人把戏。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全球化不可能舒服地结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说,除非中国在政治上变得更自由,否则中国崛起就是危险的,而且中国现在关于国际社会的愿景就会像一些人期望的那样^①无法克制“中国威胁论”。中国一些讨论“和谐”的著名文献中那些尖锐的反民主、集权主义、家长式口气无益于平息上述恐惧情绪^②。

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政策是一种必要的过渡。无论这种政策显得多么真诚,“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这些口号并不能打消外界对于“一个崛起的中

^① Li Mingjiang, “China Debates Soft Power”, pp. 300-301.

^② Zhao Tingyang, “Rethinking Empire from a Chinese Concept”, pp. 31-32. See also William A. Callahan,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国会是怎样和如何行事”的种种担心。“和谐”的提法缺乏具体性，太容易用来作为一种冷酷的实用主义政策提供掩护，使中国与别国政府或领导人打交道时采取不干涉政策，无论对方多么专制或者缺乏合法性。这正好说明，中国对它在国际体系内崛起相当良好的自我感觉与其他国家眼中的中国崛起之间可能存在不祥的隔阂。就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逻辑而言，胡锦涛关于“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只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共同繁荣”^①的观点或许正确。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将会为全球经济繁荣做出贡献，增加人类知识和技术的总量^②。但在世界其他国家看来，这一观点的经济层面与政治层面不可分离。中国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深深植根于中式思维，任何质疑声音都可能被指责为反华和反对中国崛起^③。

中国有义务向国内和世界其他国家解释它关于国际社会的愿景中的所没有明示出东西和存在的矛盾，其现有的尖锐防御姿态低估了这一义务。对外界观察人士来说，无论是站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英国学派的视角，都有为中国崛起担忧的理由。因此，任何有效的和平崛起战略中都必须要求中国聆听并化解那些担忧。令人棘手的防御姿态本身就让人们对中国一旦崛起后将做什么表示担忧。反华情绪只占对中国崛起担忧的一小部分。现实主义学者与生俱来地对任何大国的崛起表示关注，不管对方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所以，中国的现实主义学者应当很容易理解为何其他大会关注中国。自由主义学者和英国学派学者并不担心中国崛起本身，而是担心正在崛起的中国政治性质会是什么样。如果中国想成功实现和平崛起，就需要避免效仿美国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满心理，这样，其他国家不可能不感受到中国的善意。中国需要更努力像其他国家看它那样审视自身。正如拉莫所说，“如果中国希望……实现和平崛起，让其他国家接受它提出的世界观至关重要”^④。如果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就迫切需要阐明中国如何理解国际社会、如何认识其现在及未来在国际

① Hu Jintao, “Build Towards a Harmonious World of Lasting Pea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p. 4.

② Yan Xuetong, “Xun Zi’s Thought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p. 38.

③ Yan Xuetong, “The Rise of China in Chinese Eyes”, p. 28; William A. Callahan, “How to Understand China: the Dangers and Opportunities of Being a Rising Pow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1, No. 4, 2005, pp. 701-714.

④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p. 28.

社会中的定位这一疑问。笔者看来,对那些寻求创建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学者们来说,解答这一疑问应是首要任务。

五、结 语

运用英国学派研究路径分析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景,不仅可以从历史角度考察,还能结合物质力量和社会结构的关键因素。与哈利迪和米尔斯海默的观点相反,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中国有可能实现和平崛起。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未来30年将遇到比过去30年大得多的困难。中国已经在国际社会扮演重要角色,要想延续过去30年成功的崛起势头,中国需要更努力思考自身和国际社会。这一思考的进程必然会触发一些张力,但鉴于中国不能重复过去30年的老路,中国不可避免地要为崛起付出这些代价。中国有能力选择这些张力具体表现为何种形式,只要应对得当,这些张力并不必然与和平崛起冲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分析暗示,中国需要更多关注和重视区域层面与全球层面国际社会的区别以及两者的互动。显然,如果中国希望继续现在这种文化、政治民族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道路,那么最理想的环境很可能出现在亚洲这一区域层面、而非全球层面。在全球层面,西方及西方价值观仍处于主导地位,而中国当前提出的任何理念似乎都不大可能打消人们关于一个非民主大国崛起合法性的忧虑。或许最简单、人们最熟悉的办法就是防止陷入与美国的对抗;如果这种对抗在所难免,中国需要确保只有美国觉得中国崛起构成挑战。但是,如果中国希望在全球层面大展身手,就必须预料到将承受持续压力,以进一步深化国内改革、加大改革力度。中国主张的社会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相结合、关注政权安全以及有限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区域层面广泛得到认同。为了在区域内建立良好信誉,中国只需要避免威胁邻国(例如,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上保持克制,避免咄咄逼人)。把区域性国际社会的发展放在首位能让中国与西方保持距离,减小外界对中国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压力。

这一点揭示,对中国来说,通向和平崛起的途径之一是首先要在区域层次构建一个建立在“亚洲价值观”基础上、独特的国际社会。这项工程反映全球层面国际社会的后殖民主义观点,也必然代表一个更加去中心化的全球秩序。

可以这么说，当前这场经济危机为中国沿这条路走下去提供了相当大的机遇。随着华盛顿共识变得支离破碎，我们有更多空间并需要比现在更多的空间就国际政治经济学替代模式展开实验。如果这些实验以区域为中心展开，那么全球性国际社会将不再遵循全球化模式，而是建立在更强的区域性国际社会上，对和平共处、贸易与环境问题进行多元化管理^①。全球层面国际社会的“厚度”将变得更薄，而区域性国际社会就像欧盟所预示的那样，变得“更厚”、更具特殊性。

中国在区域性和全球性国际社会两者中做出的选择将深远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以及成功或失败的概率。然而，无论中国做出何种选择，就和平崛起前景而言，中日关系将是关键因素。离开日本，中国无法构建一个和平的亚洲国际社会；不能与这个主要邻国实现和平，中国也无法在一个和平的全球性国际社会不受拘束。正如前文所述，日本对中美关系有关键性决定作用。为此，中国需要修补其和平崛起战略中对日关系上的巨大缺陷，要实现这一点，中国需要比先前更为主动。由于两国政治上积怨已深，中国要改善与日本政治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关系绝非易事。中国不仅必须主动与日本修好，还需要将和解行为维持几年甚至几十年。要让这种做法见效，中国也必须仔细审视自我，反思过去那段特定历史时期对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的建构^②。思索对日政策的同时，中国也应当有能力为自身勾画一个更为一致和明确的国际形象，明白应如何在更长时期内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打交道。日本不会主动着手改善中日关系，除非它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发生混乱。秦亚青认为，日本应率先采取行动^③，但笔者不赞同这一观点。日美同盟关系能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与中国修好带来的获益却较少，而且日本国内在对待历史争议上也存在和中国一样的问题，因此日本几乎肯定不会主动改善日中关系。坐等日本主动采取行动意味着中日关系将继续恶化。既然中国能从改变现状中获益最多、从维持现状中损失最多，中国必须先日本而动。这将要求真正的政治勇气、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远见，以及长远规划、持之以恒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中国素以擅长长期外

^① Charles A. Kupchan,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a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 1998, pp. 40-79.

^② Wang Zheng,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y Edu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Memory".

^③ Qin Yaqing, "China's Security Strategy".

交和战略博弈著称,也具备大刀阔斧改革国内政策的能力,这些均使人们有理由为中日关系前景感到乐观。

和平崛起这一目标,雄心勃勃却困难重重,值得追求且崇高宏伟。完成这一目标将推动世界历史取得重要进步。和平崛起存在可能性,但不会轻松简单,要求中国有新思维。这种新思维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要更清晰地认识到中国自身认同、以及中国要建成怎样的国内社会;第二点与第一点密切关联,要更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希望促进国际社会形成怎样的形态;第三,要采取战略与日本实现恰当和解,不仅在政府层面、更要在两国民众层面实现和解。如果中国要实现胡锦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这一理想^①,这些步骤就不可避免。这似乎要让中国挑起一负沉重的担子,事实确实如此。中国崛起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令它无法回避伴随实力增长产生的责任。

^① Hu Jintao, “Build Towards a Harmonious World of Lasting Pea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作者简介

巴里·布赞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蒙塔古·伯顿教授,哥本哈根大学和吉林大学名誉教授。

电子信箱: b.gbuzan@lse.ac.uk

张 锋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讲师。2004 和 2009 年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分别获比较政治学硕士和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曾任《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编辑。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

电子信箱: fengzhangmc@gmail.com

陈 冲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 2006 级本科生。

电子信箱: nkchenchong@hotmail.com

刘 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2004、2006 和 2009 年在南开大学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译著有《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2009 年)。

电子邮箱: liufeng00@gmail.com

王树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1999 和 2002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获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著有《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2002 年)、《经济外交与中俄关系》(2007 年)等。

电子信箱: wangshuchunf209@163.com

朱 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492765184@qq.com

吴文兵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候选人。1999 年在电子科技大学获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学士学位 2007 年在新疆大学获国际政治专业硕士学位。

电子邮箱: wuwb07@mails.tsinghua.edu.cn

刘若楠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 2009 级硕士生。2009 年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获法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liuruonan.crystal@gmail.com